

“热爱书籍吧——这是知识的源泉”

我虽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也给我一
的帮助，但毕竟是有限的，使我感到^还要用不^断
还在养成自学的习惯。当然，要能自学，重要
件是要能对书籍发生兴趣、爱好，最好能达^到“
命的程度。过去有不少人，虽也上过学，但由于^对
没有产生感情，^读《三笑》中^半太师^{一个}儿子，
到读书味同嚼蜡，所以一离开学校，便^大绝^续了。
觉得这种人等就没有上过学。

我国相传有句话，叫“开卷有益”，^对书^类功^大
读书是有作用的，但^也不^然是任何书都是有^益的；看
书交友，也总有所选择。回忆自己^在学^方面的^程
过程，倒是^有临^有意思的。自己^对书^开头^是并
爱好的。记得在小学低年级时，还曾因怕挨老师的
打（^宁波^出版^社），^只在^教师^桌边^的，^我在^青少^年已^是不^知
这^东了）而逃过学，那时我^对书^是勉^强的^在读^谈
然谈^到什么^兴趣，只^觉得^既然^进了^学堂，^就只^得
书而已。

有一年的夏天，在外祖母家乘凉时，谈了瞎子

序

(一)

翁心惠同志生前是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民盟常委、宁波市民盟副主委，宁波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50年代他曾任宁波市副市长，兼任市体委主任、市教育局局长。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个人学习勤奋，学识广博，既善于演讲，又勤于笔耕，一生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学生，也留下了数十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文学等各方面。在40—50年代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经常可以在宁波的报刊和电台上，读到或听到他以“翁亭”为笔名的文章。在许多学生和读者的心目中，他称得上是宁波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和著述家。

1983年8月，翁心惠同志因病去世后，他的次子翁安佳出于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出于为社会积累文化的责任感，花了多年时间收集、整理了其父亲留下来的全部文稿，拟编成文集奉献给社会；翁心惠同志在慈溪中学（现今之慈湖中学）执教时的校友张道文和学生陆平一、童永福、戴竹馨、方平、俞嗣华等也有志于参与文集的编选，因之他们商议组成了编委会，在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文集的编选工作，并约我写一序言。我自感并不是为这本文集作序的适当人选，但一想到他生前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业绩和我们之间在革命工作中结下的真挚友谊，仍欣然应约，怀着对他的深切思念，写就了这篇短文。

我与翁心惠同志相识40多年，相知颇深。他青年时代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在抗日烽火的淬砺下，年仅17岁的他，就于1939年

7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了宁波高工学生党支部书记。以后因学校匆促搬迁,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不忘记党的教诲,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1944年,他毕业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范学院后,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在慈溪中学和鄞县师范任教。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反共反人民政策,发动内战,镇压学生,他在学生中热情传播革命思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触犯了国民党政府的禁令,两次都被迫离校,最后竟致在宁波无栖身之地,不得不到镇海一所私立中学任教。解放初,他怀着彻底的翻身感,继续在中学教育岗位上为国家培养年轻一代。1951年,经过去浙江干校学习,他受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刻教育,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转变世界观方面实现了新的飞跃。不久即被调至宁波市中苏友好协会,先后担任副总干事、副会长。1952年至1956年间,他数次当选为宁波市副市长,并被选为民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主委、浙江省政协委员。正当他处于年富力强、大展抱负之时,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一度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梅山盐场劳动。“文革”期间,他再度受到冲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案,才得以彻底改正,党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他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纵观他的一生,既是坚持革命与进步的一生,也是历经挫折和磨难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即使他在受到错误处置时,仍以党的全局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原是个破落户飘零子弟,寄人篱下不开颜。我这根‘毛’,早已无‘皮’可依。”“没有党的指引、培育,我哪能进入革命的大家庭。”“但把我当作‘敌人’,那真是无法说清,百口莫白啊!……只要有利于革命的进展,即使有天大的委屈,也要硬着头皮承担!”他还这样表示:“我服膺鲁迅先生的教导,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我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切从新开始!”他不仅这样从严要求自己,也这样帮助教育别人。在他

生命的最后三年时间里,为了把已经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争分夺秒,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自我加压,承担了超常规的工作量,完成了以往需要数倍时间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实践了自己“鞠躬尽瘁志不移”、“甘作人梯助攀登”的誓言。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他真不愧为全市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这本文集所选编的是他自1935年至1982年间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数都曾在宁波有关报刊上发表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学习他刻苦读书的经验,了解他投身教育改革所取得成果,还可从中深刻体悟到他对党、对事业、对同志、对家人的高尚情操和深厚感情。尽管这些文章撰写于不同年代,现在重新展读,仍可获得新的启示和教益。对于缺乏生活阅历的年轻一代,更具难得的实际教育意义。我衷心祝愿:《翁亭文集》的出版,能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一份有益的精神食粮,能在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张永祥

1996年2月

序

(二)

宁波解放，翁心惠同志从镇海调来宁波任教后，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就相熟了，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接着，他调至中苏友好协会任专职干部，从此我们在社会活动方面又有了较多的接触。尤其在重建民盟市组织、他当选为副市长后的数年之间，可说是接触频繁，竟成为莫逆之交。往后，彼此都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命运的相共，自然而然地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

心惠同志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热爱教育工作。他参加市政府工作期间，分管文教体卫一线，经常深入学校基层，进入教室听课，亲自参加总结学校、教师的经验，是不遗余力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宁波师范学校校长期间，患中风重病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全心扑在学校工作上，直到卧病不起。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少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口能讲，手能写，是一位能说会道的人。他的讲课或报告，不知激动过多少人。众所周知，要讲好课，作好报告，应该吃透两头，即教材或讲稿内容和学生或听众。据我所知，心惠同志除了认真备课外，更自觉地侧重于培养自己的思想感情，要求自己真正进入教材、讲稿的内容，每讲一次话，必须成为本身是如此想的，也是要如此做的。记得有一次，在杭州观看梅兰芳大师演出《贵妃醉酒》，我俩曾在开幕前去后台。那时距离梅先生出场，大约还有两小时左右，可他早已化装完整，独自静坐培养剧中角色的情感。这一情况，更使他确信作为一位灵魂工程师，首先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教育和影响别人。

心惠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于党的统战工作。大家都知

道，他对民盟工作热忱而负责。我和他在民盟市组织共事期间，更了解他从理论到切身的体会中，对党的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和民主党派的作用是有相当认识的，所以无论在会议上或友人间的言谈中，他多次提到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存在，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和优点，并认为这是值得我国人民引为自豪的。这也正是他工作的动力之一。1957年整风期间，他出于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响应党关于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毫无顾虑地提出，要学习张飞进帐讨令的赤胆忠心，竭尽己责，做好党和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想不到这竟成为他“向党夺权”的罪名。在此后的“改造”期间，他曾多次诉说，无论从个人的私利出发，还是从一贯的思想情感上检查，很难搜索到主观上反党的根子。但自己还是坚信党是绝不会把友人当作敌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他再次参加领导工作时，有人认为他变得沉着谨慎起来了，其实他是念念不忘地随时检查自己，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心惠同志待人接物是真诚的。他始终保持一位教师的身份，尤其参加市领导工作期间，不论在副市长任内或以后的复出，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别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病后身体虚弱而又工作繁忙期间，几次为了推荐一位好老师，或为促成一件有益于社会的建议而四方奔走！这些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常恨此生知己少，何堪老来哭人多！”心惠同志离世已有十多年了，但我一想到他，内心依然不能平静！我深深感到为有这样一位友人而自豪。这里想起欧阳修的《朋党论》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利为朋”的小人之朋是不能持久的，因而是“伪朋”；而只有“以同道为朋”的君子之朋，才是经得起检验的“真朋”。

钱念文

1995年12月

序

(三)

我和翁心惠兄相识远在 1944 年秋季慈溪中学的东区分部，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知己，对此事还须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历史。

抗日战争持续至 1941 年 4 月，敌人在镇海登陆，未数日而慈溪县治沦陷，慈溪中学在芦山寺临时校舍被迫解散。翌年秋，谋图在县内各区分散办学以开展敌后教育，乃设东区分部于长石桥，西区分部于三七市，北区分部于观城镇，又在南区崇本小学内附设一个班。心惠兄于 1944 年夏甫毕业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当年秋季由三五支队东区文教指导员董学陶的推荐，来东区分部任教。我当时虽主管西区分部，但因兼有校长之职而有机会至东区分部处理校务，始与心惠兄结识。迨至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慈中迅在慈城北门外原校址复校，遂于 9 月初着手归并各区分部，并汇集分部的教职员工于一校。心惠兄受聘为训育主任兼教语文，惟因原有富丽堂皇之新校舍初遭敌机数次轰炸，继又被敌伪拆毁而夷为平地，只得暂借普济寺僧寮作为师生食宿之所。又辟贞社及桂、向两祠为教室，我和心惠兄同寄住在普济寺的阉相祠，藉得朝夕相见，彼此之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十分热爱教育工作，忠诚于教育事业，对工作认真负责，处处能以理服人。从表面上看对学生有严肃的感觉，然其内心则十分慈祥，故全校学生对他都能敬而爱之，乐于和他接近。在课堂教学中则常用启发式，做到循循善诱。他擅长口才，在开会作演说时每多慷慨激昂，痛砭时政之失，常为全校师生所翕服。

心惠兄于1947年夏向我提出辞职。当时白色恐怖笼罩慈溪，我早知他曾于1939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也知他与三五支队有所联系，为了顾及他的人身安全，不得不在依依默契之中，让他离开慈溪中学。当时，他说是已应鄞县师范之聘，不料由于社会的剧变，不通音讯竟达三十余载之久，直至1979年初冬，才得于宁波与他握手重聚。我于1950年始，曾就长于上海安心中学，自知他荣任宁波市副市长兼教育局长，甚为他能舒展其才华而感到高兴。至于他于1958年后因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而遭受挫折，则皆因我自身坠入更为坎坷的命运，对诸友好的惦记之情仅能蕴藏于胸怀，故对他的情况，一切均未有所闻。直至1979年2月，他先简短寄我一信，以试探我的踪迹，俟我复信之后，继于2月20日再详细来函告知：“2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发下(1979)13号文件，批准对我改正错划，9日上午中共宁波市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并于2月13日在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两次。……这一决定的公开报导，对全市的震动极大。”这时他已被委为宁波师范学校校长，旋于1982年2月又被推举为宁波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心惠兄在受冤的悠悠二十年岁月中仍积极工作，坚信党在一定时间会给他纠正。他对党一片赤诚，始终不渝，即使身处逆境也从无半句怨言和牢骚，只是忍辱负重，夙夜盥勤，默默耕耘在教育这片园地。他说：“对党，我们既然把党比作慈爱的母亲，那就应该惦念着她的养育之恩，而不宜记着她错骂错罚之恨。”这是何等高尚而可贵的情操。他又说：“作为一个献身于教育事业者来说，我没有更高的冀求，只是希望在晚霞夕照里，尽心竭力，把这所师范学校办好，作为我晚年的事业。”他说到做到，黎明即起，从毛衙街寓所，步行走出开明街，再拖着中风后遗症的身躯，艰难地挤上公共汽车到西门外椅子巷师范学校，督促学生要“闻鸡起舞”。他这种奉献精神，迄今尚有许多师生在怀念着这位当年的好校长。

心惠兄平时勤于写作，撰述颇丰，或为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

或为体现人民群众之生活,或为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而更多的则是其自身的教学经验和对教育规律的阐述。所惜许多在战争年代发表的文章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已遭散佚。今年春,其次子安佳以其一片孝思,决意搜集心惠兄之遗著,出版《翁亭文集》,拟分赠亲友,以作为乃父诞辰七十五周年祭之献礼。此举深受各方之同情和支持。幸蒙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教委领导的重视和殷切关怀,对“文集”的出版工作时预予指示和大力资助,俾此事能得顺利进行而如期付梓。又如心惠兄生前的同窗挚友张道文君联系奔忙,当年慈湖中学的受益学生陆平一、戴竹馨、方平、俞嗣华诸君为落实经费、搜材、编辑、审稿、校对等务,付出不少精力,在在显露出一对已故恩师的崇敬和意念,令人十分感动。惟不才如我,则仅备述与心惠兄订交始末及其发人深思的数端景行,籍作流传而已,而抚今追昔,实不胜往事历历,逝者如斯之慨。

胡绳系谨志

1996年5月

翁心惠生平

翁心惠，原名召茝，笔名翁亭，1922年4月27日（农历3月17日）生于浙江鄞县石塘翁家寨的一个破落封建大家庭里。他祖父是个封建士大夫，擅长金石书画。到其父亲一代，家道已经衰败。四五岁时，因父母离异，他和弟弟一起随母亲至慈溪裘墅（现属宁波市）外祖母家寄居。1929年秋，他进宁波私立圣模小学读书。受其外祖母影响，幼年曾幻想在宗教中寻找天堂。1932年进求是小学读书，开始阅读《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关东大侠》等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又梦想长大后成为一个侠客，做一些劫富济贫的“大事业”。升入小学五年级以后，在叶圣陶、冰心、夏丏尊等作家的作品影响下，激发了学习写作的热情，作文颇受语文教师好评，故经常向《儿童世界》投稿。发表于1935年《儿童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怎样收复东北失地》等文章，是他小学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当时初步萌发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

1935年秋，翁心惠考入慈溪中学，开始阅读鲁迅、高尔基的文学作品，深受作品中革命思想的感染。继而，又喜爱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兴趣逐步移向社会科学，并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面刻苦读书，一面投入抗日爱国运动，参加了慈东抗日自卫委员会，积极向群众作抗日宣传演讲，还编辑《国难周刊》，并被推选为周刊的总编辑。1938年夏初中毕业后，他在裘墅一带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翌年春，他参加慈溪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期间受到了党史党章教育，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年仅17周岁。不久，因受国民党特务监视，

离开政工队，经党支部同意考入宁波高工土木科，从事学生运动，担任高工党支部书记，并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高工匆促西迁至丽水，他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因之中断。当年11月，他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范学院。读书期间，他与进步同学发起组织春雷文艺社，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长，负责编印《春雷》刊物，并常用“翁亭”笔名向社会报刊投稿。1944年7月毕业后，因怀念慈母，只身回到日寇统治下的宁波，经同事介绍，进费市峰山补习班（即慈溪中学东区分部）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慈溪中学迁回慈城，翁心惠被聘为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师。他在学生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学生，支持进步学生投奔革命队伍。1946年6月，他在慈溪中学毕业纪念刊上发表的《赠别光复第一届毕业同学》一文，文字虽短，却倾注了他对学生的一片深情，表达了他祝愿学生奔向希望地方的心声。他的行动，引起了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的不满，最终不得不被迫离开慈中。1947年春，他受浙大校友、鄞县师范校长黄达晶之聘，到该校任语文教师。鄞县师范当时学生运动活跃，原来的训育主任被学生赶走，校长征得学生代表同意，聘他继任训育主任。任职后，他热情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经常向学生宣传时事形势，还鼓励学生组织演出《一片爱国心》、《阿Q正传》等进步戏剧，因而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爱戴。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了宁波《大报》副刊《同学》的主编；1947年10月，他在《同学》副刊上发表谈一位同学来信的文章，要求青年学生正确对待苦闷，做精神上的坚强者、富裕者，充分表现出他与青年学生意授神交，心心相印。1948年4月，在宁波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监事；8月，还当选为慈溪中学校友会主席。1948年7月，鄞县师范校长黄达晶被国民党政府撤职，继任的校长是国民党反动骨干夏方林。夏一到任，立即实行一系列压制学生的措施，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夏坚持要开除带头反对校方的进步学生，翁心惠与进步教师一起，抵制反动校长的专横行为，给进步学生以尽可能的保

护。学期结束时,反动校长在开除14位进步学生的同时,也解聘了他与另外5位进步教师。1949年2月,他因在宁波找不到一个谋生之职,被迫去镇海,应聘于爱国人士黄声远先生创办的辛成中学,此间仍坚持在《宁波日报》、《宁波晨报》上发表文章,反映青年的呼声。

1949年5月25日宁波、镇海解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与镇海人民一起迎接解放军先遣部队,还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热烈欢呼镇海解放》的报道在报纸上发表。当年7月,他参加了宁波市中教暑期研究会。9月,与妻子俞珏一起被分配到鄞县县中(现为宁波第二中学),他担任教导主任。解放的喜悦使他迸发出满腔热情,他在教学上取得出色的成绩。1950年9月,他被选为宁波市政教研究会副总干事。当年11月,他参加浙江干校学习,被聘为干校校刊通讯员,并在校刊上先后发表《劳动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等文章。这些文章既反映了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转变世界观的实际收获,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取得成功的真实记录。1951年3月,他被调到宁波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先后被选为副总干事、副会长。这期间,他不辞劳苦,深入工厂、学校、群众团体、居民里弄,宣传中苏友好,宣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讲解形势与任务。他的演讲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思想性,又有鼓动性,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1952年11月,在宁波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会议上,他当选为宁波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1953年10月,他兼任市体委主任。此后,在宁波市第一、二届人代会上,他又继续当选为副市长,兼任市教育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深知自身责任重大,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经常到文教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广泛倾听文教界朋友的意见。文教系统哪里有集会,他总要到那里去作动员;哪里有困难,他也总要到那里去研究解决办法,自觉当人民的勤务员。为解决中学师资缺乏这个影响全市教育的突出问题,他力主筹建宁

波师范专科学校,亲自参与筹建工作。1956年10月9日,在宁波师专首届开学典礼上,他亲自到会作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全校师生把教师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岗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为办好全市第一所高校而献身。这篇讲话是他高度重视师范教育的很好见证,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有益教诲。平时,他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仍挤出时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撰写剧评影评,参加市文联组织的文学讲座,为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出于对党的崇仰与信赖,翁心惠担任副市长后,曾多次向党组织提出重新入党的申请,并对个人在抗战时期与党失掉联系未想方设法寻找组织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党组织当时从全局考虑,希望他在党外更好地发挥作用,他当即自觉服从党的决定,申请参加民盟组织。在民盟内,他先任盟小组召集人。1953年12月,民盟宁波市分部筹委会成立,他被选为主委;1954年11月27日,任省文联宁波会员小组组长;1955年1月,宁波市举行首届盟员大会,成立市委会,他被选为主任委员。同年2月,被提名为省政协委员。4月25日,在省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6月,在浙江省民盟会议上,被推举为出席全国第二次盟代大会的代表。1956年2月到北京参加会议,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期间见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为此激动不已,当即写了《我握到了毛主席的手》一诗,在省报、市报上发表,表达了他对人民领袖的无比崇敬和爱戴之情。这年2月,他被任命兼任宁波市教育局局长。4月,他又在民盟浙江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委会常务委员;5月,被选为省文艺理论研究干事会干事。

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翁心惠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打击。这年11月,经过数个月的内部批判,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市报、省报以至中央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1958年3月,被撤销副市长和民盟宁波市主任委员的职务,下放梅山盐场劳动。当时,他有难言之痛,仍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严检查自己,听从组织安排。在下放劳动期间,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一边劳动,一

边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加强自我改造。在梅山盐场,他写下了这样的杂咏诗句:“成千大军上梅山,开创盐场海滩中,我亦有幸与盛举,书生不怕担子重”,表达了自己的乐观精神和豪迈气概。在艰苦的劳动中,他不幸患了肝炎。住院治疗期间,他忍着病痛,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1962年2月,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调到宁波一中,任教高中语文。这时,他开始把自己的精力用于研究提高中学教学质量,不仅自己认真钻研教材,还帮助教研组教师共同提高。《关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问題》、《语文讲读教学中的文道关系问题》、《如何结合学习雷锋进行写作指导》三篇文章,就是他花了相当功夫整理出来的教学经验总结。这些文章曾对当时提高学校教学质量起了有益的作用。

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翁心惠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受到迫害,他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吃了不少苦头。1970年4月宣布“解放”后,他不计个人恩怨,仍一如既往地提高语文教学水平而呕心沥血,先后编写了《五四运动》、《人民的军队》、《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汉字浅析》等教学参考资料。为增强学生学习写作的兴趣,他还编辑了《学生作品选》,激励学生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干劲倍增,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全力做好学校教学工作。1978年暑期,他在参加全国高考阅卷中发现考生语文答卷错误百出,基础很差,心情沉重,当即写了《拨乱反正,努力改进文言文教学》一文,提出了改善和加强中学文言文教学的意见。1979年后,他又连续写了《从中专阅卷谈到语文教学亟须改革》、《论师道与教育民主》等多篇文章,深入分析语文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些文章在报刊发表后,引起有关方面的普遍重视,推动了学校教学改革。

1979年2月,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翁心惠的“右派”错案得到彻底改正,被任命为宁波第十二中学副校长。1980年

1月,又被任命为师范学校校长;2月,任港甬联谊会筹备委员会副会长;5月,当选为海曙区人民代表,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7月,当选为民盟省委常委;9月,当选为民盟市委副主任委员。1981年3月,被选为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1982年1月,被选为市人大代表;2月,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4月,当选为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党的政策的全面落实,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他决心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在师范学校校长岗位上,他对学生关怀备至,每天清晨步行40分钟,在起床铃敲响以前,从家中赶到学校,督促学生参加早锻炼;每天晚上在熄灯铃敲响、学生入睡之后,再从学校步行回家,并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发扬优良校风。在民盟领导工作岗位上,他积极协助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尽力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在港甬联谊会的领导工作岗位上,他热情接待宁波籍的港台同胞,向他们宣传介绍改革开放政策,动员他们参加家乡的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他还以强烈的激情,投身于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1979年至1982年这短短三年中,他先后写出了研究鲁迅、陶行知的文章5篇,教育论文5篇,散文、回忆录、剧评15篇,诗作25篇。这是他一生中作品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有些作品还是在他患了脑血栓右手瘫痪后硬用左手写的。1979年国庆前夕,他创作的一首献给建国三十周年的长诗,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真挚的感情,热情歌颂了党,歌颂了社会主义,表达了永远献身党的事业的坚强决心。他在诗中写道:“回顾来路多曲折,前面犹有万重关,老骥历劫心未已,志壮何愁鬓毛斑。唯有无私能无畏,甘作人梯助登攀。……,鞠躬尽瘁誓不移,定叫红旗飘宇寰!”这首诗是他思想风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一生经历的最好的总结。

从1982年6月开始,他逐渐感到胃部不适,进食困难,身体日渐不支,但仍坚持工作,忙着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议,处理一项又一

项公务。7月间尽管病情已经很重,仍然到各高考点巡视;还支撑着去参加市政协教育组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听取政协委员对小学危房调查的意见。7月底,他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参加建军节的庆祝活动,慰问驻甬解放军。8月2日,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他才被送进医院。经诊断为癌症晚期,从此,病情日益恶化。在弥留之际,他再次提出回到党的怀抱的要求。中共宁波市委根据他的遗愿和一贯表现,决定恢复他的党籍。8月17日11时1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8月24日,宁波市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邵一萍在致悼词中,对他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评价:“翁心惠同志一生热爱教育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堪为我市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楷模。”翁心惠简历编入《宁波市志·人物传略》。

“一瞬失斯人,碧水丹山皆呜咽;千秋存定论,雄文美德足流传。”这是宁波教育界几位好友追悼他的一副挽联,也是人民群众对他一生的形象评语。

(陆平一 整理)

目 录

薛驹题字

项秉炎题字

翁心惠照片

序言一（张永祥）	（ 1 ）
序言二（钱念文）	（ 4 ）
序言三（胡绳系）	（ 6 ）
翁心惠生平（陆平一）	（ 1 ）

〔思想篇〕

“富人”和“穷人”（1935年）	（ 1 ）
怎样收复东北失地（1935年）	（ 3 ）
我的甘苦谈（1940年12月）	（ 5 ）
奔向希望的地方（1946年6月）	（ 7 ）
做精神上的坚强者富裕者（1947年10月）	（ 8 ）
“半”——过渡性（1950年）	（ 10 ）
劳动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1950年12月）	（ 11 ）
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1951年1月）	（ 13 ）
略谈向上爬（1951年1月）	（ 15 ）
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1951年1月）	（ 17 ）
站稳立场 分清敌友（1951年6月）	（ 20 ）
欢呼和歌颂（1954年7月）	（ 21 ）
从灾区慰问归来（1956年9月）	（ 23 ）
爱子女就应该让子女下乡（1964年7月）	（ 26 ）
从“救救孩子”到“俯首甘为孺子牛”（1981年7月）	（ 28 ）
《决议》照亮了知识分子的心（1981年8月）	（ 36 ）